

南方局领导的 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

唐正芒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南方局领导的 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

唐正芒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为抗战服务的革命文化是五彩缤纷的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作者在搜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严谨的态度、求实的精神、生动的笔调，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统区文化运动的主体部分，即中共中央南

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探讨和深入研究，系统论述了南方局领导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并在学术研究上就这一课题的某些方面填补了空白。

该书条理清晰、文字流畅、观点鲜明、逻辑性强，是一本融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优秀读物。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正确的领导，广阔的阵容…………… (1)

一 相持阶段到来前后国统区抗战
文化运动的基本状况…………… (2)

二 南方局的成立 努力改进对抗战
文化运动的思想政治领导…………… (15)

三 巩固和扩大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27)

第二章 艰辛的奋斗，卓著的成就…………… (42)

一 努力为抗战呐喊呼号的进步报刊
…………… (43)

二 在抗日民主斗争中不断发展的
文艺戏剧运动…………… (61)

三 社科战线的成就及其对抗战的
指导作用…………… (82)

第三章 坚决的斗争，有力的反击	(98)
一 反击投降逆流 坚持团结抗战	(99)
二 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	(111)
三 批判为法西斯独裁统治张目的“战国策”派	(123)
四 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和对反共逆流的反击	(131)
第四章 必要的批评，有益的争论	(143)
一 批评“与抗战无关”论	(143)
二 对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批评	(149)
三 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159)
四 《讲话》的传播与关于“主观论”的论争	(171)
第五章 更高的目标，更新的阶段	(185)
一 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广泛开展与中共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186)
二 以“民主宣言”为标志的大后方文化运动的新阶段	(191)
三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文化界新的斗争的开始	(201)
结束语 优良的传统，宝贵的经验	(203)
参考文献	(217)
后 记	(225)

前 言

党的文化工作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决定研究党的文化工作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历史上任何伟大的革命斗争、政治运动直至革命战争，都会有伟大的文化运动与之配合。抗日战争作为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规模最大的反侵略战争更不例外。蓬勃繁荣的抗战文化运动对伟大的抗日战争起了极重要的支持、配合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中所指出的：“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

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①他还指出：当作观念形态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具体说来，产生和发展于伟大抗战年代的抗战文化，它对广大的抗日群众起了巨大的动员、鼓舞和激励作用；对抗日同盟者起了有力的团结、斗争和争取作用；对日本侵略者起了无情的打击、揭露和瓦解作用；对抗战的发展起了极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当时人们曾说“握着文化的火炬反抗侵略”，^②就是形象地指明了文化对于抗战的极端重要性。为此，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③

文化的力量是无形的，但它对于战争所必需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却是难以估量的。列宁在纪念《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时曾写道：“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

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④同样，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在山河破碎、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多少人失去亲人，多少人远离故土，谁能说一首《义勇军进行曲》、一出《放下你的鞭子》的街头戏，不会使素不相识的中国本乡人、外乡人、南方人、北方人、沿海人、内地人，都亲近起来、凝聚起来、团结起来、振奋起来，共同以血肉之躯，筑起反抗日本侵略的“新的长城”！

正是由于文化对于抗战极端重要，因此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时领导了“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⑤而在国统区，因为没有我党领导的政权、军队，更没有直接的军事指挥权。虽然党的工作也要服务于党领导的军事战线的斗争，但党领导文化战线的工作更占有突出的地位。文化战线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研究中共在国统区的历史，则党领导的文化工作尤其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过去在党史研究中，对党的文化工作的研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8页。

② 《新华日报》1938年2月13日。

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7页。

④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⑤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7页。

究从总体上看是较为薄弱的，对党在国统区的抗战文化工作的研究就更少。尽管有些文化专史也含有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内容，但大多未与中共的领导直接联系起来考察。至于对本课题所要探讨的作为党领导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主体部分，即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系统研究，就更是语焉不详、凤毛麟角了。为此，笔者选择了这一课题尝试进行研究，以求能对这一研究的薄弱环节多少起点弥补作用。这本小册子，就是在对这一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初步成果。

“文化”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宽泛的概念。据有人统计，学术界对“文化”下过一百多种定义，既有广义与狭义之争，更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别。然而本课题所要探讨的“文化”，不是物质文化而是精神文化，不是广义的文化而是狭义的文化，即是作为哲学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的文化，主要是指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思想理论、教育、社会科学等内容。

列宁曾说，要准确认识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就要看是哪个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

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① 根据对列宁这段话的内涵的理解和把握，笔者觉得不能认为在国统区的抗战文化活动中，一定要有中共组织或党员出面活动才算是党的领导。有些主张或活动，是党通过党外进步人士出面去贯彻实施的；有些活动或斗争，虽然是党外人士直接组织或开展的，但因它是中共长期抗日宣传和中共的抗日民主、团结进步思想影响的结果，符合中共的一贯主张，体现出共产党所代表的进步方向，本书也都视为党领导的抗战文化运动内容而写进其中。也就是说，本书说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是指广义的“领导”，而不是狭义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最理想的史学方法是历史、逻辑与理论的统一。本书也力图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写作。但由于抗战时期场面壮阔、事件繁多、理论丰富，不少事件发生于相同或相近的时间内，因此本书并未完全依时间顺序来展开叙述和划分章节，而是按照事件或问题同时兼顾时间先后而设置章节的。在论述同一事件或问题时，则尽量按时间先后予以论述和评价。此外，为了行文的方便，本书标题里的“大后方”，在文中有时也称“国统区”。

① 参见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功。”大后方的抗战文化运动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涉及问题多而复杂，不少问题有较强的专业性，各类问题的现有资料也多寡悬殊。我因该课题有重大意义而被吸引，但一旦饶有兴趣地进入“角色”时，才不断发现了上述种种困难，深感自己的学识十分浅薄，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大课题，实属力不从心。幸得我的导师王渔教授、副导师周养儒教授的热情鼓励、全力支持和精心指导，才有了现在这样一个稿子。现值这本小册子出版之际，谨对二位恩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恳切希望在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能继续得到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作者

第一章

正确的领导 广阔的阵容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是惊天动地的壮举，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其战争规模之宏大、持续时间之久长、血战场景之壮烈、胜利意义之深远，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伟大的战争需要文化的伟力为之呐喊、为之呼吁、为之讴歌、为之服务；而战争本身时时都在发生着的剧烈变化和重大事件，又随时都向文艺工作和文化事业提出了特殊的时代要求和崇高的历史使命。由此，伟大的战争造就了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文化又服务于伟大的战争。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战争与文

化之间的这种必然联系和本质特征,在从政治上、军事上擘画抗战宏图、潜心抗战指挥的同时,也以其卓越的胆识、宽广的胸襟、正确的策略、娴熟的艺术,成功地领导了包括大后方在内的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运动,使其取得了中外文化史上并不多见的杰出成就。它与军事上的辉煌胜利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中华民族英勇反抗外敌侵略的壮丽画卷,并成为五彩缤纷的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是中国抗战文化运动中斗争艰巨、成就卓著、地位突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中最成功的最好的阶段。一次董必武从重庆回到延安,专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南方局的工作。“主席听了汇报以后说,我是在苏区工作,搞打仗的,不懂得白区工作,这次听了董老的汇报,使我茅塞顿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很艰苦,很努力,有很大成绩。”^①这三个“很”字,是南方局工作的真实反映,也是毛泽东对南方局工作的高度评价。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对南方局领导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艰苦工作和巨大成就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

一、相持阶段到来前后国统区 抗战文化运动的基本状况

(一) 相持阶段到来之前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概略

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稍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作为广义的抗战文化运动,若从“九·一八”算起,已有了7年之久的历史,如早在“九·一八”事变

后的第四天,鲁迅就发表了揭露日本侵华反动面目的文章;阳翰笙也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进行了中篇小说《义勇军》的创作。特别是东北一批青年作家,“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上海及关内各地,创作了不少反映东北军民抗日斗争的作品,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等等。1931年12月上海文化界反帝同盟成立后,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更日趋活跃。那时虽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救亡文化运动的发展受了很大限制,甚至遭到残酷的迫害、镇压,一度又陷入低潮,但自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党的左倾错误逐步克服,特别是“一二·九”运动之后,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又重新出现了高涨的局面。

“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文化界奋起救亡。面对日寇侵略野心的扩大,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及文化志士,群情激昂,怒火满腔,他们迅速以笔当枪,杀向抗日战场。或奔赴火线采访,报道杀敌战况;或发表宣言通电,揭露日寇暴行;或举办文艺公演,慰劳守土将士;或以戏剧、歌咏、演讲、报告、壁报、漫画等各种形式,鼓舞前方士气,动员后方民众。一时间,救亡呼声震撼华夏,抗日怒涛席卷全国。而素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更迅速成为全国抗日救亡文化中心。大量知名文化人聚集上海,各种各样的救亡文化团体相继建立,救亡报刊不断涌现,抗战文化活动空前活跃。

平、津、沪、宁相继失陷后,大批文化人又陆续转移到武汉、长沙、广州、昆明等地。特别是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更成为上海失陷后新的抗战文化中心。国民党在这里留驻了党务、军事、财政、外交等许多机构。中共中央派出了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建立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及秘密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郭沫若、茅盾、老舍、阳翰笙、邹韬奋、胡愈之、胡风等数以千计的文化名流,汇聚于这白云黄鹤之地。一时

^① 孔原:《关于南方局的几点情况》,《回忆南方局》第1页,重庆市党史工委编。

长少咸集、群英荟萃。各种文化团体、抗战报刊纷纷成立或创办，抗战文化盛极一时：“三厅”组成“名流内阁”，“文协”形成“作家团结的豪华版”，“新华”成为广大群众的抗日号角……大革命失败后沉寂了10年的江城，这时又重新沸腾、再度热闹。

1938年4月1日在武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是军委政治部负责文化宣传的一个厅。它名为国民政府隶属的一个机构，实际是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具体负责，以中共党员为核心，同时吸收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文化统一战线组织。郭沫若^①任厅长，阳翰笙任办公室主任秘书，下设一般宣传、艺术宣传、对外与对敌宣传三个处，分别由胡愈之、田汉、范寿康任处长。三厅还附属10个抗战演剧队、4个抗战宣传队、3个电影放映队、1个漫画宣传队，还辖有孩子剧团、战地文化服务处、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寒衣委员会等。三厅内部建立了由周恩来直接负责的领导干部党小组和由冯乃超任书记的基层特别党支部。三厅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利用合法地位，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在文艺创作、抗战宣传及同顽固派斗争等方面，为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堪称中共领导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坚强堡垒。

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亦是全国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针对平、津、沪、宁相继陷落后，大批文化人一时几成散兵游勇、缺乏组织的状况，中共通过公开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三厅以及秘密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文化人中的地下党员的工作，促成了“文协”的成立。老舍、郭沫若、茅盾、田汉等45人为文协理事；周扬

等15人为候补理事；老舍、胡风、郁达夫等15人为常务理事；周恩来、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文协未设主席或理事长，由紧跟共产党的非党人士老舍任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文协设总务、组织、出版、研究四个部，出版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积极筹建各地分会。它在中共领导下，在广泛团结文艺界人士、深入开展抗战宣传、推动作家积极从事抗战文化活动、保障作家权益、开展文艺理论论争等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是全国文艺界几乎与抗战共始终的统战组织，是中共实际掌握的又一个抗战文化堡垒。

在“文协”成立前后，还有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协会、中华全国摄影协会以及众多的剧社剧团等抗日文化团体，在武汉先后建立并积极开展活动，这些便形成了以三厅和文协为核心的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共同促成了武汉抗战文化运动空前活跃的局面。

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办的《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全国性党报。这是与国民党多次谈判斗争的结果，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新华日报》先后由长江局和南方局领导，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总编辑华岗（后有变动）。该报曾设董事会，先后由陈绍禹（王明）和周恩来任董事长。周恩来长期领导和直接参加《新华日报》的工作，许多重要社论、代论、专论都由他亲自撰写。《新华日报》和设在该报社内的中共机关理论刊物《群众》的公开出版，打破了国民党一党垄断舆论的局面，为团结人民、争取同盟者、打击敌人争得了阵地。在武汉的9个多月时间里，《新华日报》高举团结抗战旗帜，大力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及时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业绩，积极动员后方民众投身抗战，不断发

① 郭沫若1927年8月入党。后经组织同意旅居日本，抗战时期回国后被复组织关系，但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战文化运动等活动，1958年以重新入党的形式，公开党员身份。

出改善民权民生的呼吁。它虽也有不少缺陷,但总的看来,不失为“党的喉舌,抗日号角”。^①

除《新华日报》外,武汉还有一些进步或较为进步的报纸如《大公报》《前进日报》《时代日报》《新民报》等,尤其是抗战期刊异彩纷呈,至武汉失守前达到近百种,且大多是由共产党人主办、掌握或影响的刊物。孙越崎老人在回忆中就曾说过:有一次蒋介石打电话问住在孙家的邵力子:“你知道现在的刊物有多少是共产党的?”邵力子回答:“我查查嘛!”蒋介石生气地说:“我知道百分之九十是共产党的,你做宣传部长怎么不知道?”^②这个时期武汉的出版业也迅速兴盛。包括在中共领导下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等共有50多家出版机构先后迁汉复业或在汉创办,它们积极出版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这也是构成武汉抗战文化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时在长沙,由于中共的努力及主政湖南的张治中较为开明,加上其“辖毂南北、控制东西”的重要地理位置,也有大量的知名文化人士前去开展文化活动,从而使长沙出现了极为活跃的抗战文化运动,成为“除武汉以外”的有名的文化城。^③同时,长沙和衡阳后来还成为广州、武汉失陷后文化重心西移的重要中转站。

在上海失陷后,一些文化工作者撤退到广州,他们和广州文化人一道,建立文化团体,开展新闻、戏剧、歌咏、美术等活动,恢复了在上海创办而又在上海失陷后停刊了的《救亡日报》,并使之成为中共在华南地区最主要的舆论阵地。于是抗战初期在

广州也出现了宣传抗日救亡的生动局面,它与香港的抗战文化运动汇合起来,一度成为对外特别是对东南亚华侨宣传抗战的重要基地。

重庆、成都、永安、昆明、桂林、贵阳、西安、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等地,也都不同程度地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热潮。

总之,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艰苦努力,也由于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系总的说来还较好,国民党这时“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④所以“这时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⑤因此可以说,相持阶段到来之前,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虽有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但从总体上看还是蓬勃发展的。

(二) 相持阶段到来后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和文化运动的新情况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相持阶段到来后,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由于速战速决梦想的破灭,由于人力、物力、财力、军力的严重匮乏,陷入了骑虎难下的窘境,不得不停止对中国的战略进攻,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它还对英美表示,欢迎第三国对中日战争的“善意斡旋”。英美则希望通过对日妥协以保护其在远东的利益,便积极策划玩弄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劝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停战讲和”。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况下,一贯主张对日妥协的汪精卫集团不久即

① 《党的喉舌抗日号角——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

② 孙越崎:《回忆邵力子先生和我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88辑第10页。

③ 参见任作民:《抗战初期湖南的文化状况》(1940年4月21日),《长沙文化城》第33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④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1页。

⑤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页。

公开叛国投敌。

“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而被迫着赞成抗日”^①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汪精卫投降的背景下，抗战立场大为动摇。这时其政策重心即由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转为对付共产党，逐渐对共产党采取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们害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接连制造反共磨擦，多次掀起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一方面不得不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以粉碎国民党的灭共阴谋，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的整体利益。

相持阶段到来后的上述政治形势，特别是国民党政策的逆转和由此而决定的国共关系的变化，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治方针相联系，在文化方面，国民党顽固派改变了原来有所松动的文化政策，收回了人民已经争得的一些有限的民主自由权利，而重新实行反动的文化专制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武汉失陷以后，为第二阶段，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勱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②在这个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接二连三地颁布许多限制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所谓政策、法令，并以法西斯手段强令推行，甚至在文化战线也施行特务统治，对进步文化人进行暗中监视、迫害与抓捕。他们还利用思想文化阵地，抛出大量的诸如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

国情、共产党应予取消、马列主义应暂搁一旁等反动谬论。一些甘心为国民党独裁统治服务的反动文人则炮制为法西斯专制统治张目的反动文化理论。中间势力中也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提出一些有害抗战而有利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错误文化理论和文化思想。

与对国民党顽固派政治上军事上的反共行为必须坚决反击一样，对于国民党在文化上的反动，我们也不能不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此，在相持阶段到来后，党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大军，除了必须继续大力宣传抗战外，还增加了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文化政策、文化思想进行斗争的任务。即必须从理论上和行动上开展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揭露和批判为维护独裁统治造舆论的反动文化理论，坚决反击和驳斥取消共产党等反共叫嚣以及妥协投降倾向，还必须对一些危害抗战的错误文化思想展开必要的批评。而所有这些斗争，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从文化方面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好地加强全民族的抗战力量，坚持抗战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共两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上述各方面斗争，使南方局领导下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大致表现为：第一阶段，从武汉失守至皖南事变，属于大后方的抗战文化运动在斗争中继续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国民党主要是由过去相对宽松的政策改为严密防范、控制和限制，其法西斯高压政策尚未立即和广泛推行。因此，在南方局的领导下，革命文化大军一方面批判和抵制反动文化政策，一方面大力宣传抗战并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继续发展。第二阶段，从皖南事变到豫湘桂战役大溃退，属于在反动派的压迫下艰难向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政治、军事上反共的加剧，国民党顽固派在文化上也大力推行专制主义和法西斯高压政策，砍杀进步作品，停办进步报刊，迫害文化志士，并大造国民党一党独裁和取消共产党的反动舆论。因此这一阶段矛盾更尖锐，斗争更激烈，环境更艰难。南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9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页。

方局领导进步文化界在继续大力宣传抗战的同时,又在多方面同顽固派展开坚决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千方百计保护和关心进步文化人,从而将抗战文化运动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推向前进。第三阶段,从豫湘桂战役溃败到抗日战争胜利,属于文化斗争性质逐渐转变的阶段。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最后一年里,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加上其政治上的腐朽及军事上的溃败,大后方掀起了此伏彼起的反蒋独裁的人民民主运动,“文艺运动立刻参加到了这时候的民主运动中”,^①并推动着这个运动的发展,从而使抗日民主文化运动逐步向人民民主文化运动转变。

如果说国民党推行积极反共政策,是相持阶段到来后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不利形势一面的话,那么王明右倾错误的被纠正,则是这个时期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有利形势的一面。

王明原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7年11月29日他回到延安,12月就反对中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抗战路线。随后,他到当时的抗战文化中心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照搬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精神,多次发表讲话和文章,鼓吹一系列投降主义的观点和主张。他抹杀统一战线中不同党派和政治集团的阶级差别,提出只要是抗日的都来,主张统一战线内不要再分左、中、右,只能“以抗日或降日为分野”,即所谓“凡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敌”;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只联合不斗争,放弃领导权;轻视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不切实际地强调军事上的一切“统一”等等。

王明这种右倾投降主张,不可能不反映到抗战文化运动中并对其造成干扰和影响。如1938年8月20日武汉“青救”、“民先”和叙社等抗日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的被国民党强令解散,就

是王明强调群众组织要取得合法和统一的投降主义主张贯彻的直接后果。王明还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直接下令解散了一些由中共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受其影响和干扰更大。王明以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兼任该报董事长,直接插手报社的工作。他声言“要用欧洲的经验来抓宣传工作”,试图把党报变成他推行右倾错误的工具。他利用该报的社论鼓吹要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作为团结救国的方针。提出“要建立真正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组织、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补给、统一政治工作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国防军”。若果真这样“统一”,人民就不会有自己的军队了。他还在该报《关于游击战争》的社论中贬低游击战争的作用,说它只是“辅助战术”,“不能进行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只有正规战方能歼灭敌人,赶走日寇”。他还利用对《新华日报》的控制权,拒绝刊登毛泽东的深刻阐述了游击战争重要战略地位的《论持久战》一文,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予刊载。

在保卫大武汉的问题上,王明也与中央指示相对立,他不把工作重点放在广大农村,看不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而一味跟着国民党高喊“保卫大武汉”,进行片面宣传,竟让《新华日报》为此而发表了十余篇社论。此外,在王明的干扰下,《新华日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也宣传过多、分量过重、版面过宽,且只宣传胜利,不报道失败,即使明显是失败了,也以别的字眼替代、掩饰。这些都是王明追逐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心态在新闻宣传上的体现,是王明右倾对抗战文化运动的干扰和影响。

正在相持阶段到来之际,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系统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路线。虽然王明在会上没有检讨和承认错误,会上也未对他作组织处理,但因中央撤销了长江局,把王明留在延安工作,这就从组织上避免了他的右倾错

①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1949年7月)。

误再对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产生消极影响。这对于在国民党实行积极反共政策的大后方相持阶段的抗战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是个难得的有利条件。

相持阶段到来后还有一个新情况是文化人的撤退与文化力量的重新组合。即广州、武汉失陷前,滞留在广州、特别是武汉的大批文化人和文化机构,大多向重庆、桂林等大西南地区撤退,由此出现了文化力量的重新组合和文化中心的再次转移。

武汉失守前,国民党的党政机关相继迁到重庆,并宣布重庆为陪都。随着国民党党政军财文机构的西迁,许多文化人和文化机构也相继迁渝。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等率领三厅成员自武汉撤退到长沙,再经衡阳、桂林辗转到重庆。三厅所属的抗敌宣传队、演剧队此前已分赴各战区进行抗敌宣传演出;孩子剧团则随三厅经桂林来到了重庆。“文协”总务主任老舍于1938年7月底即携文协总会印鉴来到重庆并开展工作,9月,文协正式迁到重庆。文协领导人之一的胡风,武汉失守后退到宜都小住三月,再由老舍推荐去复旦大学(重庆北碚)任教,由此来到重庆。熊佛瑛、潘梓年、华岗、戈茅(徐光霄)等率《新华日报》人员并运送重要机器设备,分批由武汉溯江西上入渝。著名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也分别由武汉和广州迁到重庆。文化名人邹韬奋、侯外庐、巴金、曹禺、杜国庠、胡绳等也都先后到了重庆。一些著名的高等院校如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也迁到了重庆。大批文化人和文化机构的西迁入渝和他们在南方局领导下迅速掀起的抗战文化热潮,与原在重庆的文化人及其开展的方兴未艾的救亡文化汇合在一起,这样就使重庆不仅是国统区的政治军事中心,而且成了国统区的抗战文化中心。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重心这时也已西移至重庆。

广州、武汉失守后,西南重镇、广西战时省会桂林成了联结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并且是通过香港联系海外特

别是南洋各地的重要通道。因此,在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文化重心西移中,桂林便以其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批文化名人驻足其间或去那里开展文化活动。如夏衍在广州失陷后率《救亡日报》同仁于11月上旬来到桂林,并于1939年1月10日恢复《救亡日报》的出版。原在武汉的新知书店,是中共直接领导的在国统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重要阵地。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决定迁重庆时,新知书店负责人徐雪寒、华应申认为“桂林将成为西南文化中心,政治环境及印刷出版条件较好,需要有一个出版机构,以配合作家及文化界的活动,因之决定将新知书店总店迁往桂林”。这样,新知书店总店以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也迁到桂林”。^①三厅主管宣传动员工作的处长、1933年9月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的著名文化人胡愈之,经组织安排,辞去在三厅的职务,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留在桂林做桂系的统战工作并开展文化活动;范长江在武汉失守后,也脱离《大公报》到桂林,与胡愈之等在桂林创办了国际新闻社总社,并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桂林开展了影响广泛的新闻活动。戏剧大师欧阳予倩1938年4月起就已在桂林开展抗战剧运,除中间离桂驻港一年和桂林沦陷时疏散外,先后在桂林坚持战斗达7年之久。戏剧家田汉也以桂林为主,奔波于桂林、长沙、衡阳、重庆及战区等地,大力开展抗战戏剧活动。茅盾亦在桂林留下了文学足迹,作出了杰出成就。新安旅行团于1938年11月到桂林后,与广州沦陷后艰难跋涉来桂林的广州儿童剧团以及先后到桂林的孩子剧团、厦门儿童剧团、长沙育英儿童剧团等儿童团体汇合,开展了各种儿童抗战宣传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由各沦陷区到桂林的进步文化人

^① 徐雪寒:《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第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有1000多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科学家、教授、专家、学者即有200多人。这在当时文化落后的中国,实在是个不小的数字!他们在南方局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下,建立了众多的文化团体,创办了大量的报刊及多达200来个的书店和出版社,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当时桂林曾被誉为西南大后方的文化绿洲和闻名遐迩的文化城。

此外,在高等学校的内迁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由平、津南迁至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早在广州、武汉失守前的1938年4月,该校就已再迁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闻一多、朱自清、吴晗等知名教授则随该校西迁到昆明(或其附近)。他们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广泛团结进步师生,开展卓有成效的抗战文化活动,使西南联大成为有名的“民主堡垒”,进而推动了昆明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广州失陷后,粤北曲江(今韶关)成为广东战时省会。广东党政军各机构、文化机关、报刊、学校、文化团体相继迁入曲江,众多的文化人士也随之北迁。于是曲江便成为广东战时新的政治、文化中心。

此外,成都、贵阳等地也有一些从沦陷地区迁去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文化名人,在那里开展抗战文化运动。还有一些文化人则在广州、武汉失陷后由党组织安排去了延安或华北抗日根据地,也有一些人去了新四军。

以上情况表明,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战局的变化,使中共领导的抗战文化力量实际上重新进行了一次排列与组合,这使文化队伍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进一步扩大了党领导的抗战文化运动的范围和影响,拓宽了进步文化人的政治视野,并进一步丰富了他们的生活阅历和创作素材,从而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增强了为抗战服务的意识,更坚定了以文化知识为抗战贡献力量的决心。但另一方面,大批国土的沦丧,加上这种

艰危的辗转流徙,给文化人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不少困难,也难免使有的文化人对抗战必胜的前景认识渺茫,给抗战文化运动带来一定损失,并使党领导文化人和文化运动的工作更趋艰难和繁重。

南方局就是在上述有利和不利形势交织的背景下成立,并开始对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领导的。

二、南方局的成立 努力改进对抗战文化运动的思想政治领导

(一) 南方局的成立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武汉失守后实际上已不存在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并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设立南方局,分管南部中国大后方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的名称最初中央拟称“西南局”,如1939年1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提议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西南局,其组成人员为: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等13人,以周恩来为书记。后因是月7日,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央书记处,认为在华南及西南各省成立的中央局“以南方局名称为好”,13日,中央书记处才复电周等同意用南方局的名称,同时并决定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常委。除华南、西南各省外,江西、上海的工作也归南方局管;南方局机关设在重庆,桂林设立办事处。至此,南方局即正式成立。

立。

1月16日,南方局致电中央书记处,报告其委员分工是:博古组织,凯丰宣传及党报,周恩来统战,叶剑英联络,吴克坚报馆,邓颖超妇女,并建议中央派蒋南翔来南方局负责青年工作。中央后来实际批准的六位常委的分工是:周恩来为书记,博古负责组织,凯丰负责宣传和党报,叶剑英负责联络,吴克坚负责报馆,董必武负责统战,另以邓颖超和蒋南翔分别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和青年工作委员会。

南方局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统战工作委员会、文化宣传工作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室、社会部、华侨工作组、南洋工作组、敌后工作委员会和秘书处等10余个部门。其中文化宣传工作委员会(“文委”)由凯丰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徐冰任秘书,委员5人。下设书记组、宣传组、文化组、新闻组,分管文化工作和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党员与非党干部。后来凯丰很快离开重庆回延安,文委的工作则主要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又因统战、宣传、报馆、妇女、青年等部门与文化工作的密切关系,故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也参与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在此前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正式建立,钱之光任处长。南方局是秘密的,重庆“八办”是公开的,以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大本营。而建立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南方局,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战斗司令部和指挥中心,也是国统区和延安联系的桥梁。它领导大后方的党组织和人民,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进行着顽强的工作和斗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其中也包括领导大后方进步文化人开展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发动的规模宏大的抗战文化运动,从而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在文

化战线上建树的辉煌业绩。又因为当时这种斗争远远超出了文化运动本身的意义,而对政治、军事、统战等方面的斗争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因此,领导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更成为南方局光辉历史上的极重要篇章。

(二) 抗战文化运动正确思想理论的形成

南方局一成立,就将抗战文化运动继续作为一件重要的大事来抓。尽管当时处于相持阶段后政治形势的剧变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战文化运动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制、刁难和破坏,以及文化人撤退和文化重心西移而带来了各种新的困难,但却仍在原有基础上、在较短时间内打开了新局面,取得了新成就。之所以能如此,应该说首先是得益于王明右倾错误的被纠正,特别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和南方局由抗战文化实践中逐步探索出的正确思想理论的指导。

如前已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纠正和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与此相适应,为了进一步消除其在文化运动中的影响,这次会议还对文化教育政策作了明确规定。其基本精神是要“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政府只是“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而不能使文化运动事事受政府束缚。会议要求“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①会议还强调“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②这就在文化运动方面克服了王明造成的事事让人束缚的右倾错误,初步制订了放手发展人民的抗日文化运动、不断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尽快改变抗战的文化教育不适应抗战的状况的正确抗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16、6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同上。

战文化指导和方针政策。此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周恩来和南方局在抗战文化运动实践中又陆续对之予以丰富和充实，从而逐步形成了有关抗战文化运动的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及方针政策。

第一，关于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性。党把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作为“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认为它“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为此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对发展抗日文化问题“特别提请注意”，“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①既然是“极端重要的工作”，“极应该广泛发展”，那就必须摆脱国民党的诸多束缚和限制而放手发展，就必须同顽固派的限制政策与迫害行为作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是说，抗日文化运动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在文化运动中也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要坚持在抗日前提下的统一，又要独立自主地不断扩大抗日文化队伍、广泛和放手发展进步文化事业。

第二，关于抗战文化的基本指导方针。1939年8月4日即南方局成立半年后，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统一战线问题作了长篇报告。在阐述文化宣传工作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是我党文化政策的方向。”“文化运动的口号应该是：民族化、大众化、民主化。”^②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就是以这一基本精神作为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指导思想的。这与毛泽东在五个多月后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以及再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抗日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文艺运动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泽东强调：“所谓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③所谓“民族的”，就是它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应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所谓“科学的”，是指它必须反对和批判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对外国的进步文化批判地吸取。所谓“大众的”，则是指它必须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毛泽东还强调，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但就整个国民文化的内容来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更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当作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同时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勤劳的人民大众和小有产者占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④因此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文化就必须是为这肩负抗日重任的劳苦工农阶级和“小有产者”服务，而不能是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少数法西斯统治阶级服务。相反，对于“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⑤就是说，在抗日文化运动中也必须做到，在注重民族矛盾的前提下不忽视阶级矛盾，在坚持民族斗争的前提下不放弃阶级斗争。可见中国共产党这时的抗日文化指导方针是既克服了十年内战时期左的共产主义国民文化教育方针；也不同于抗战初期只谈抗日、只谈国防，不分阶级、不分人民大众甚至否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右的文化指导方针，进而又较好地处理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因此这时的文化指导方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39年8月4日。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708页。

④ 《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1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页。